

私人转移支付如何影响农村留守家庭成员消费?

宋成校, 胡浩*, 万悦

(南京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5)

摘要: 基于中国土地经济调查微观数据, 构建“私人转移支付、农地转出与留守家庭成员消费”理论框架分析私人转移支付对农村留守家庭成员消费的影响, 并从农地转出视角揭示其内在逻辑。研究发现: 私人转移支付会显著降低农村留守家庭成员消费支出, 尤其是生存型与享受型消费支出, 并扩大消费不平等, 且这种负向效应在中低消费水平的农村留守家庭成员中更为显著。路径分析表明: 私人转移支付促使农村留守家庭成员转出农地, 降低了留守家庭成员的经济地位感知与收益时间偏好, 扩大家庭收入差距, 导致消费减少与消费不平等程度提高。

关键词: 留守家庭成员; 私人转移支付; 消费; 农地转出

中图分类号: F323.8; F832.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24)04-0010-12

How does private transfer payment affect the consumption of rural left-behind family members?

SONG Chengxiao, HU Hao*, WAN Yue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micro-data of China Land Economic Survey, the impact of private transfer payment on the consumption of rural left-behind family members has been analyzed by constructing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private transfer payment, farmland transfer and consumption of left-behind family members”, and the inner logic has been reveal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rmland transfer. It is found that private transfer payment would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of rural left-behind family members, especially the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of subsistence and enjoyment; it would also widen the consumption inequality, and for the rural left-behind family members with low and medium consumption levels, this negative effect is more obvious. The path analysis shows that private transfer payment would induce the rural left-behind family members to rent out or sell farmland, thus reducing their economic status perception and income time preference, widening the household income gap, and resulting in reduced consumption and increased consumption inequality.

Keywords: left-behind family members; private transfer payment; consumption; farmland transfer

一、问题的提出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近年来, 虽然我国居民总体消费水平不断提高, 但增速呈现放缓态势^[1]。面对当前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经济压力, 必

须充分释放农村内需潜力^[2]。一方面, 我国农村人口占比较高, 而消费却占比偏低, 启动和扩大农村消费市场对促进经济增长十分关键^[3]。另一方面,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2022 年居民消费数据,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同比实际下降 1.7%,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同比实际增长 2.5%, 农村居民消费存在较强的增长潜力。充分挖掘农村消费市场是提振内需的关键举措^[4]。

收入是影响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决定性因素。根据经典凯恩斯消费理论, 消费主要取决于当期收

收稿日期: 2024-05-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3&ZD109)

作者简介: 宋成校(1992—), 男, 江苏沛县人, 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与管理。*为通信作者。

人与边际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取决于个人消费习惯,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增加消费支出必须提高收入水平^[3]。对于农村留守家庭成员(简称留守家庭成员),收入来源主要分为农业收入以及外出务工成员的私人转移支付。私人转移支付是留守家庭成员现时收入的重要补充^[5],影响其预算约束与消费支出。理论上,私人转移支付通过增加留守家庭成员的收入刺激其消费支出^[6,7]。但实地调研发现,获得私人转移支付会导致留守家庭成员消费支出减少,并扩大消费不平等。揭示该现象背后的原因需要追根至农户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土地。事实上,私人转移支付会促进留守家庭转出农地,进而影响个体经济地位感知、收益时间偏好与家庭收入差距,最终表现为消费支出降低。厘清私人转移支付、农地转出与留守家庭成员消费之间的内在关联,对于刺激农村消费、提振内需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与此相关的文献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私人转移支付对农业生产经营的影响。Taylor 等认为,私人转移支付对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存在重要的推动作用^[8],这一观点得到许多学者证实^[9,10]。然而,一些学者提出,私人转移支付作为留守家庭成员的现金收入并不会被用于农业生产投资,而且劳动力的流失会对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7,11-14]。二是私人转移支付对留守家庭成员消费或者福利的影响。Nguyen 等研究均表明,私人转移支付能够显著增加留守家庭成员消费支出^[15,16],尤其是促进发展和享受型消费支出比例提升^[17],并提高留守家庭成员健康水平^[18,19]、减缓留守家庭成员贫困^[20]。但 Lipton 以及 Adams 和 Cuenca 等的研究并不支持上述观点^[21,22],私人转移支付对留守家庭成员消费没有显著影响,对缩小福利不平等的作用甚微^[23-25]。另外,李江一和闫雪凌研究发现,父母对子女的私人转移支付能够减少子女的劳动供给时间,但不会使其退出劳动力市场^[26]。

与国际研究相比,国内私人转移支付效应的研究尚不充分^[27],尤其是结合农户兼具生产者与消费者双重身份特征的逻辑分析与实证检验不足,这也是造成现有研究存在争议的重要原因。农户作为生产者其基本要素为土地,作为消费者其效用关联消费,探讨私人转移支付的经济效应,需要结合土地利用与消费行为深入分析。基于此,本研究试图做

出如下拓展:第一,构建“私人转移支付、农地转出与留守家庭成员消费”分析框架,从农地转出视角分析私人转移支付为何导致留守家庭成员消费支出下降。第二,基于上述分析框架,从经济地位感知、收益时间偏好与家庭收入差距方面揭示农地转出影响留守家庭成员消费的内在机制。第三,考察私人转移支付、农地转出与留守家庭消费不平等之间的关联。通过上述分析,旨在为当前农村消费与土地流转领域的相关研究提供思考与启示。

二、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说

(一)“私人转移支付—农地转出—留守家庭成员消费”分析框架

本文将私人转移支付、农地转出与留守家庭成员消费纳入同一分析框架,揭示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根据唐钧^[28]等学者的定义,由于家庭主要劳动力外出务工,其子女、父母和配偶就成为留守在农村老家的亲属,由这些留守亲属(或其他家庭成员)构成的家庭即为留守家庭;而留守家庭成员消费指这类留守在农村老家的家庭成员的消费支出(主要包括留守家庭成员的食品、医疗、教育、文化等消费),不含外出务工成员的消费支出。私人转移支付内涵丰富,包括家庭内部父母与子女之间、外出务工成员与留守家庭成员之间,以及亲戚、朋友之间的现金或实物的馈赠。结合本文研究主题,参考王子成^[9]、李晓春和杨彩姣^[10]、邹薇和樊增增^[27]等学者的阐释,本文中的私人转移支付是指农村家庭外出务工成员(由农村流入城镇,且长期生活、工作在城镇部门的家庭成员)在获取非农收入后,将收入的部分资金转移给仍留守在农村地区生活的家庭成员,即留守家庭成员。本质上,私人转移支付是家庭成员之间的契约关系^[29],也是家庭内部之间非正式借贷形成的结果^[30],能够优化资金要素配置,实现家庭效用最大化。本文借鉴并拓展 Böhme 的思路^[31],构建含留守家庭成员跨期消费决策的效用函数,揭示私人转移支付、农地转出与留守家庭成员消费之间的关系。假设留守家庭成员的效用函数形式如下:

$$U = u(C_1) + \beta \cdot u(C_2) \quad (1)$$

其中, C_1 表示留守家庭成员获得私人转移支付后的当期消费, C_2 为下一期消费; $\beta = \frac{1}{1+\theta}$, $\beta (0 < \beta < 1)$ 表示留守家庭成员的主观贴现因子,数值

越大说明越看重未来消费,从而会减少当期消费支出; θ ($\theta > 0$)即为留守家庭成员的效用折现率。同时,效用函数满足 $U'(\cdot) > 0$, $U''(\cdot) < 0$ 。

在不考虑私人转移支付对留守家庭成员农业生产经营行为的影响时,面临的约束条件可以表示为:

$$\text{s.t. } C_1 = y_1 + R(M) - I - S + k_0 + r_1 k_0 \quad (2)$$

$$C_1 + k_1 = (1 + r_1)k_0 + y_1 + R(M), k_1 = I + S$$

$$C_2 = (1 + r_2)k_1 + y_2 \quad (3)$$

其中, y_1 为留守家庭成员当期自有收入; k_0 为初始财富水平; r_1 为当期利率水平; $R(M)$ 为获得的私人转移支付(R 为劳动力迁移 M 的函数); I 为农业生产投资(考虑到本研究的核心,将农业生产投资行为聚焦为农地流转); S 为留守家庭成员的储蓄。

假设留守家庭成员资源配置有效率,可以得出 $dC_1/dR =$ 正常数,说明在不考虑私人转移支付及其背后的农业劳动力迁移的情况下,当期消费是私人转移支付的增函数。然而,留守家庭成员兼具生产与消费双重身份,私人转移支付及其背后的劳动力迁移会影响农业生产经营投资,例如,获得私人转移支付意味着家庭有农业劳动力转移至非农就业部门,造成农业劳动力损失。研究私人转移支付对留守家庭成员消费的影响,需要进一步讨论农业生产投资情形。假定农业生产函数形式如下:

$$Q = f(K, L) \quad (4)$$

其中, K 为资本; L 为家庭劳动总量;生产函数满足如下条件: $f'_K(\cdot) > 0$, $f''_K(\cdot) < 0$, $f'_L(\cdot) > 0$, $f''_L(\cdot) < 0$ 。为简化分析,该模型不考虑农业生产经营中的风险,且没有雇佣劳动力。当然,这种处理方式并不会对核心结论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在考虑农业生产经营后,私人转移支付的函数形式如下:

$$R = g(M, W, E, \beta; X) \quad (5)$$

式中, M 为迁移出的农业劳动力数量; W 为迁移劳动力的工资水平; E 为劳动力迁移成本; β 为留守家庭成员的主观贴现因子^①; X 表示其他影响私人转移支付的特征变量。基于上述假设与分析,留守家庭成员的生产函数形式如下:

$$Q = f(k_1, L - M) \quad (6)$$

假设不存在资本市场,这也符合当前农村信贷市场的基本情形,那么资本积累的过程可用如下公式表示:

$$k_2 = (1 - \delta)k_1 + I \quad (7)$$

其中, δ 代表资本折旧。此时,留守家庭成员消费行为的约束条件如下:

$$\text{s.t. } C_1 + k_1 = (1 + r_1)k_0 + p_1 \cdot f(k_1, L - M) + g(M, W, E, \beta; X) \quad (8)$$

$$C_2 = (1 + r_2)k_1 + p_2 \cdot f[(1 - \delta)k_1 + I, L] \quad (9)$$

其中, p 是留守家庭成员生产的农产品的市场价格; r 为储蓄回报率。将上述约束条件变形可得:

$$C_1 + \frac{C_2}{1 + r_2} = (1 + r_1)k_0 + p_1 \cdot f(k_1, L - M) + \frac{p_2 \cdot f[(1 - \delta)k_1 + I, L]}{1 + r_2} + g(M, W, E, \beta; X) \quad (10)$$

令 $(1 + r_1)k_0 = V_1$, $p_1 \cdot f(k_1, L - M) + \frac{p_2 \cdot f[(1 - \delta)k_1 + I, L]}{1 + r_2} = H$, 则有:

$$C_1 + \frac{C_2}{1 + r_2} = V_1 + H + g(M, W, E, \beta; X) \quad (11)$$

将其代入留守家庭成员效用函数可得:

$$U = u(C_1) + \beta \cdot u\{[V_1 + H + g(M, W, E, \beta; X) - C_1] \cdot (1 + r_2)\} \quad (12)$$

根据 C_1 的一阶条件:

$$dU/du(C_1) = u'(C_1) + \beta \cdot (1 + r_2) \cdot u'\{[V_1 + H + g(M, W, E, \beta; X) - C_1] \cdot (1 + r_2)\} = 0 \quad (13)$$

据此得到最优条件下的欧拉方程:

$$u'(C_1) = \beta \cdot u'(C_2)(1 + r_2) \quad (14)$$

欧拉方程显示了影响留守家庭成员消费决策的重要因素,即主观贴现因子 β 或效用折现率 θ 与利率。在外部利率水平一定的前提下, β 在私人转移支付影响留守家庭成员消费行为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下将重点分析私人转移支付与农地转出如何影响留守家庭成员的 β 值。一方面,私人转移支付降低了留守家庭成员投资农业的可能性。基于效用函数与约束条件,可以得到农业生产投资(I)的一阶最优条件:

$$u'(C_1)/\beta \cdot u'(C_2) = p_2 \cdot f'_I[(1 - \delta)k_1 + I, L] \quad (15)$$

式中,等式右边为农业预期收益。现实中可替代性假说不成立^[30],即私人转移支付有时会被用于留守家庭成员的特定支出(如老年人医疗、子女教育等),而非投资于农业生产活动。同时,私人转移支付代表着家庭内部农业劳动力转移,造成农业劳动力流失与农业总收益下降。因此,留守家庭成员未来农业边际收益 $p_2 \cdot f'_I[(1 - \delta)k_1 + I, L]$ 预期会降低,根据式(15), β 值会相应提高,说明留

守家庭成员会减少当期消费。

另一方面,从农地要素的非经济属性能够给予部分解释。对于获得私人转移支付的留守家庭成员,外出劳动力往往会劝说留守家庭的老年劳动力减少农业劳动时间,增加闲暇与休息时间。农地流转政策的适度支持以及转出后的租金收益,也会促使留守家庭转出农地。但农地自古以来便是农户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发挥着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险的作用^[32-34],农地转出会导致留守家庭成员更加节约地利用资金,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强(β 值提高),当期消费支出减少。另外,获得私人转移支付的只是部分留守家庭,由于家庭异质性等原因,在上述现象发生的过程中,还会伴随着消费不平等的扩大。据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₁:私人转移支付会促进留守家庭成员转出农地,负向影响其消费支出并扩大消费不平等。

(二) 农地转出影响留守家庭成员消费的机制分析

上述分析揭示了“私人转移支付、农地转出与留守家庭成员消费”之间的内在逻辑,若深入分析农地转出如何降低了留守家庭成员消费,需要进一步考察储蓄(S)的一阶最优条件:

$$u'(C_1)/\beta \cdot u'(C_2) = (1+r_2) \quad (16)$$

$$u'(C_2) = \frac{1}{\beta} \cdot \frac{1}{1+r_2} u'(C_1) = \frac{1+\theta}{1+r_2} u'(C_1) \quad (17)$$

根据式(17),如果留守家庭成员的效用折现率 θ 很小,减小至低于 r_2 ,此时留守家庭成员的当期消费倾向会降低,更偏好于储蓄。则有:

$$u'(C_2) \leq u'(C_1) \quad (18)$$

根据留守家庭成员效用函数的性质来看, $U'' < 0$, $U' > 0$,可以得到:

$$u(C_2) > u(C_1) \quad (19)$$

$$C_1 < C_2 \quad (20)$$

因此,如果 θ 很小(β 值很大),那么留守家庭成员的当期消费支出会显著降低。事实上,对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而言,农地转出会降低其经济地位感知、收益时间偏好,并扩大收入差距,导致留守家庭成员的 θ 值减小,负向影响其消费支出并扩大消费不平等。

1. 农地转出、经济地位感知与留守家庭成员消费

一般而言,在收入一定的前提下,留守家庭成员的经济地位感知越弱则 θ 值越小,对未来的收益信

心不足,做出多储蓄、少消费的决策。较弱的经济地位感知无法促使低收入家庭效仿高收入家庭的消费行为^[35],甚至会导致低收入家庭缩减消费支出,并扩大不同收入水平家庭之间的消费不平等。对于留守家庭成员,农地转出会显著降低其经济地位感知。农地作为农户最重要的物质财产之一,为其提供了基本生产生活资料与基础生存保障;农地转出会给留守家庭成员带来基础物质保障功能弱化的心理感受,降低留守家庭成员的经济地位感知与 θ 值,负向影响其消费支出,并扩大不同留守家庭之间的消费不平等。据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_{2a}:农地转出通过降低留守家庭成员的经济地位感知,负向影响其消费支出并扩大消费不平等。

2. 农地转出、收益时间偏好^②与留守家庭成员消费

根据生命周期理论,家庭会将其资产置于整个生命周期内进行决策分配,实现跨期消费平滑^[36]。一般而言,更加看重未来收益或效用的留守家庭成员的收益时间偏好越低(θ 越小),从而会增加储蓄或进行其他投资,减少当期消费^[37,38]。而农地转出会通过两种渠道降低留守家庭成员的收益时间偏好。一方面,农地转出带来的租金收入是相对短期的未来收益,基于显示偏好原理,该行为决策表明留守家庭成员的收益时间偏好较低。另一方面,农地转出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留守家庭成员的获得感与安全感,出现对未来基本生活保障的担忧,增强其预防性储蓄动机,减少当期消费支出,同时也会使得不同留守家庭之间消费不平等程度提高。据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_{2b}:农地转出通过降低留守家庭成员的收益时间偏好,负向影响其消费支出并扩大消费不平等。

3. 农地转出、收入差距与留守家庭成员消费

收入是消费的决定因素,收入差距扩大会导致消费不平等程度提升。同时,留守家庭成员的储蓄或非消费动机也会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而提升,进一步减少消费支出^[39,40]。而农地转出会扩大不同留守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从农业收入差距看,若当地非农就业机会多,“剩余土地”将会流向财富相对丰裕的高收入农户手中,农地流转将会扩大农业收入差距^[41],这种差距降低了留守家庭成员的 θ 值。从非农收入差距看,农地转出可能意味着更多的家庭劳动力向非农就业部门转移,但非农劳动力的收入以及向留守家庭成员的转移支付金额存在较大

差异,自然会扩大不同留守家庭之间的非农收入差距。据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_{2c} : 农地转出通过拉大不同留守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负向影响其消费支出并扩大消费不平等。

三、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微观数据来自2020年南京农业大学组织开办的中国土地经济调查(CLES)。该项调查涉及内容广泛,包括农业生产、土地利用、农村家庭等各个方面,很好地满足了本研究开展实证检验的需要。调查采用PPS抽样方法,从江苏省13个地级市中抽取26个调研区县,每个区县分别抽取2个样本乡镇,每个乡镇抽取1个行政村,每个村随机抽取50户农户。样本共计52个行政村和2600户农户,剔除异常值与缺失值后,保留了2453份有效样本。

(二) 基准回归模型

1. 私人转移支付对留守家庭成员消费影响的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OLS模型实证检验私人转移支付对留守家庭成员消费支出的影响,具体形式如下:

$$CON_i = \alpha_0 + \alpha_1 REMIT_i + \sum_{j=2}^{12} \alpha_j \cdot X_{j,i} + \gamma_i + \mu_i \quad (21)$$

其中, CON_i 为被解释变量,表示第*i*户留守家庭成员的消费支出情况; $REMIT_i$ 为核心解释变量,代表第*i*户留守家庭成员获得的私人转移支付; $X_{j,i}$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 α_0 为常数项, $\alpha_1, \dots, \alpha_{12}$ 为相应变量的回归系数; γ_i 为地区控制变量; μ_i 为随机误差项。

差项。

2. 私人转移支付、农地转出与留守家庭成员消费的模型设定

基于前文分析,在私人转移支付影响留守家庭成员消费支出的路径中,农地转出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本文利用逐步回归方法,检验上述路径是否成立,模型具体形式如下:

$$LAND_i = \alpha_0 + \alpha_1 REMIT_i + \sum_{j=2}^{12} \alpha_j \cdot X_{j,i} + \gamma_i + \mu_i \quad (22)$$

$$CON_i = \alpha_0 + \alpha_1 REMIT_i + \alpha_2 LAND_i + \sum_{j=3}^{13} \alpha_j \cdot X_{j,i} + \gamma_i + \mu_i \quad (23)$$

其中, CON_i 为第*i*户留守家庭成员的消费情况; $LAND_i$ 为第*i*户留守家庭成员的农地转出行为; $X_{j,i}$ 为控制变量; α_0 为常数项, $\alpha_1, \dots, \alpha_{13}$ 为变量回归系数; γ_i 为地区控制变量; μ_i 为随机误差项。

3. 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被解释变量为留守家庭成员消费,一是使用留守家庭成员总消费支出衡量,二是以留守家庭成员消费率(留守家庭成员消费支出/留守家庭成员总收入)反映。核心解释变量为私人转移支付,以“家庭外出务工成员给留守成员的汇款”衡量。另一关键变量为农地转出规模,以“转出在外的耕地面积”衡量。在控制变量设定方面,选取留守家庭60岁以上人数、16岁以下人数、受教育程度、家庭是否有干部、是否党员户、非农工作经历、家庭收入、政府补贴、耕地面积、村庄治理效果与村庄产业发展作为控制变量。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表1 变量定义及统计描述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全部样本		获得私人转移支付		未获得私人转移支付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留守家庭成员消费	留守家庭成员消费支出的对数值	10.236	0.812	10.088	0.779	10.276	0.816
私人转移支付	获得私人转移支付金额的对数值	1.806	3.542	8.571	1.233	—	—
农地转出	是=1; 否=0	0.596	0.491	0.642	0.480	0.583	0.493
农地转出规模	转出农地面积的对数值	0.881	0.826	0.965	0.825	0.858	0.823
60岁以上人数	60岁以上人数	1.267	0.870	1.416	0.821	1.227	0.879
16岁以下人数	16岁以下人数	0.533	0.690	0.493	0.684	0.544	0.691
受教育程度	留守家庭人均受教育年限	7.274	2.669	7.044	2.678	7.336	2.652
家庭是否有干部	家里有没有人当干部	0.148	0.355	0.126	0.332	0.153	0.361
是否党员户	家里是否有党员	0.297	0.457	0.279	0.449	0.302	0.459
非农工作经历	有几人从事过非农工作	1.630	1.278	1.636	1.362	1.628	1.255
家庭收入	留守家庭其他收入的对数值	7.811	3.316	9.470	0.825	7.368	3.560
政府补贴	有补贴=1; 没有补贴=0	0.780	0.414	0.791	0.407	0.777	0.416
耕地面积	承包的或者分到的总耕地面积	5.216	6.611	5.126	5.273	5.240	6.926
村庄治理效果	不满意 <1-2-3-4-5> 非常满意	4.069	0.759	4.054	0.719	4.073	0.769
村庄产业发展	不满意 <1-2-3-4-5> 非常满意	3.436	0.973	3.412	0.960	3.443	0.976

从消费支出的均值来看,获得私人转移支付的留守家庭成员消费支出低于未获得私人转移支付的留守家庭成员,二者均值分别为 10.088 与 10.276,初步表明私人转移支付与留守家庭成员消费存在一定关联。从农地转出情况看,获得私人转移支付的留守家庭农地转出均值为 0.642、农地转出规模均值为 0.965,二者均高于未获得私人转移支付留守家庭成员的均值(分别为 0.583 与 0.858),说明私人转移支付、农地转出与留守家庭成员消费之间存在一定关联。根据家庭人口结构,获得私人转移支付的留守家庭老年人数量明显高于未获得私人转移支付的留守家庭,隐含着一种逻辑:获得私人转移支付是由于留守家庭劳动力较少、老年人较多,缺乏获取其他收入来源的能力;同时,老年人数的增加也对农业生产经营存在一定约束,会导致留守家庭成员逐步转出农地。上述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本文构建的“私人转移支付、农地转出与留守家庭成员消费”分析框架具有现实依据。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私人转移支付对留守家庭成员消费影响的回归结果分析

私人转移支付对留守家庭成员消费支出、消费率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回归 1 在模型中未纳入任何控制变量,结果显示,私人转移支付每提升 1%,留守家庭成员消费支出下降 0.018%,且这种负向关系在 1%的水平上显著。回归 2 在模型中纳入控制变量后显示,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私人转移支付每提升 1%,留守家庭成员消费支出会显著下降 0.016%。回归 3 与回归 4 以消费率作为被解释变量,结果表明,私人转移支付与消费率之间同样存在显著负向关系。表 2 实证结果表明,私人转移支付会显著降低留守家庭成员的消费支出。

从其他方面来看,60 岁以上人数、16 岁以下人数分别与留守家庭成员的消费支出显著负相关、正相关,说明老年人数的增加会降低留守家庭成员消费支出,而未成年人数增多会增加留守家庭成员消费支出。事实上,在消费的各项影响因素中,家庭人口结构是基础性因素^[42]。受教育程度、家庭是否有干部、非农工作经历、家庭收入、耕地面积以

及村庄治理效果均与留守家庭成员消费支出显著正相关。

表 2 私人转移支付对留守家庭成员消费影响的回归结果

变量	消费支出		消费率	
	回归 1	回归 2	回归 3	回归 4
私人转移支付	-0.018*** (0.018)	-0.016*** (0.005)	-0.033*** (0.003)	-0.015*** (0.002)
60 岁以上人数		-0.042** (0.021)		-0.053*** (0.014)
16 岁以下人数		0.262*** (0.023)		0.091*** (0.018)
受教育程度		0.056*** (0.007)		0.019*** (0.004)
家庭是否有干部		0.173*** (0.045)		0.113*** (0.034)
是否党员户		-0.014 (0.037)		0.011 (0.024)
非农工作经历		0.031** (0.015)		0.027*** (0.010)
家庭收入		0.015*** (0.006)		-0.311*** (0.011)
政府补贴		0.033 (0.046)		-0.027 (0.028)
耕地面积		0.007*** (0.002)		0.005*** (0.002)
村庄治理效果		0.048** (0.023)		0.030* (0.016)
村庄产业发展		0.020 (0.018)		0.003 (0.012)
地区变量	未控制	已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10.279*** (0.018)	9.275*** (0.128)	0.575*** (0.017)	3.079*** (0.127)
R ²	0.006	0.175	0.044	0.456

注:***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1$;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同。

(二) 私人转移支付、农地转出对留守家庭成员消费影响的回归结果分析

私人转移支付、农地转出对留守家庭成员消费影响的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回归 1 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后,私人转移支付与农地转出规模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私人转移支付每提升 1%,农地转出规模将增加 0.009%。回归 2 将私人转移支付与农地转出纳入同一模型,估计结果显示私人转移

支付、农地转出规模均与留守家庭成员消费支出存在负向关系,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农地转出是导致私人转移支付与留守家庭成员消费支出负向相关的重要路径。回归3中被解释变量为消费率,结果进一步表明私人转移支付促进留守家庭成员转出农地,减少消费支出。

表3 私人转移支付、农地转出对留守家庭成员消费影响的回归结果

变量	农地转出规模	消费支出	消费率
	回归1	回归2	回归3
私人转移支付	0.009*** (0.003)	-0.014*** (0.005)	-0.014*** (0.002)
农地转出规模		-0.059*** (0.021)	-0.038** (0.016)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地区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1.250*** (0.417)	9.322*** (0.135)	3.145*** (0.133)
R ²	0.168	0.187	0.456

表4 以私人转移支付比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的检验结果

变量	消费支出	消费率	农地转出规模	消费支出	消费率
	回归1	回归2	回归3	回归4	回归5
私人转移支付比	-0.221*** (0.060)	-0.181*** (0.032)	0.199*** (0.057)	-0.180*** (0.062)	-0.171*** (0.034)
农地转出规模				-0.064*** (0.022)	-0.038** (0.016)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地区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8.506*** (0.171)	3.120*** (0.127)	1.274** (0.173)	8.606*** (0.178)	3.183*** (0.132)
R ²	0.204	0.455	0.194	0.208	0.455

2. 剔除部分样本的回归结果

为减少样本选择带来的估计误差,本部分剔除部分样本重新进行回归。一是剔除存在信贷约束的样本。受信贷约束的留守家庭成员,消费行为更加谨慎,倾向于缩减消费开支以缓解信贷约束;并且,信贷约束越强越有可能转出农地,将这类样本放入回归模型会影响实证结果的精确性。二是剔除五保、低保或残保户样本。他们生活水平不高,收到私人转移支付或许是急需用以缓解经济困难,将其作为样本不具备一般性。三是剔除没有非农就业的样本。通过比较有非农就业、有私人转移支付与有

五、稳健性检验与拓展性分析

(一) 稳健性检验

1. 以私人转移支付比作为核心解释变量

不同家庭的资源禀赋、收入结构与要素配置等存在差异,导致私人转移支付对留守家庭成员的作用与影响不同,以绝对值的形式考察私人转移支付对留守家庭成员消费的影响可能存在偏差。为此,本文构建私人转移支付比变量(私人转移支付/留守家庭成员总收入),以相对指标的方式检验私人转移支付对留守家庭成员消费的影响。表4回归1与回归2的估计结果显示,私人转移支付比与消费支出、消费率之间均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而私人转移支付比与农地转出规模显著正向相关(回归3)。将私人转移支付比与农地转出规模置于同一模型中,根据回归4与回归5可知,私人转移支付比、农地转出规模均与消费支出、消费率负向相关,且至少在5%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上述结果说明,私人转移支付通过促进农地转出影响留守家庭成员消费的逻辑通过了稳健性检验。

非农就业但无私人转移支付的样本,能够增强样本匹配程度与可比较性。四是排除留守家庭成员存在丧失劳动力与身体状况较差成员的样本。这类留守家庭成员收到私人转移支付或许是由于健康状况引发的特殊需求,将其作为样本也不具一般意义。五是排除家庭当年发生重大事件^③的样本,降低其他事件冲击对消费的影响。根据表5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无论如何剔除样本,私人转移支付与留守家庭成员消费支出的负向关系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私人转移支付通过促进农地转出降低留守家庭成员消费支出的逻辑进一步被证实。

表 5 剔除部分样本的检验结果

变量	剔除存在信贷约束的样本		剔除五保、低保或残保户样本		剔除没有非农就业的样本		排除健康因素的干扰		排除重大事件的冲击	
	回归 1	回归 2	回归 3	回归 4	回归 5	回归 6	回归 7	回归 8	回归 9	回归 10
私人转移支付	-0.013*** (0.005)	-0.011*** (0.005)	-0.019*** (0.005)	-0.017*** (0.005)	-0.025*** (0.005)	-0.023*** (0.006)	-0.020*** (0.005)	-0.019*** (0.006)	-0.014*** (0.005)	-0.013** (0.005)
农地转出规模		-0.057*** (0.022)		-0.063*** (0.021)		-0.054** (0.023)		-0.040* (0.025)		-0.055** (0.023)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地区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9.304*** (0.133)	9.359*** (0.141)	9.314*** (0.133)	9.379*** (0.139)	9.417*** (0.146)	9.436*** (0.155)	9.290*** (0.158)	9.330*** (0.166)	9.357*** (0.145)	9.406*** (0.153)
R ²	0.177	0.190	0.169	0.182	0.126	0.134	0.160	0.172	0.164	0.177

3. PSM 模型的估计结果

考虑到研究样本可能存在自选择偏误问题，导致估计结果产生偏差，本文采用 PSM 模型缓解这一问题。选取近邻匹配、卡尺匹配、核匹配与局部线性回归匹配四种方法，保证匹配结果的稳健性。利用 PSM 模型需要保证控制变量满足匹配平衡性检验。从样本匹配结果来看，对于 60 岁以上人数变量，在匹配后处理组与控制组的均值差异明显降低，偏误降低比例达到 95.3%，并且根据 P 值可以判断，由匹配前的 0.000 增加至 0.850，表明处理组

与控制组之间的差异变得不显著。其他控制变量在匹配后，偏误比例均降低至 5% 以下，且大多数变量的 T 检验表明，处理组与控制组之间无系统性差异。总体而言，控制变量的样本匹配结果比较好^④。PSM 模型净效应的估计结果见表 6。

根据表 6 中的 ATT 估计值可知，私人转移支付会导致留守家庭成员消费支出下降 21.2%~24.2%、消费率下降 11.8%~13.4%，且均在 1% 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进一步证实基准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表 6 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检验结果

	消费支出				消费率			
	近邻匹配	卡尺匹配	核匹配	局部线性回归匹配	近邻匹配	卡尺匹配	核匹配	局部线性回归匹配
ATT	-0.242*** (0.052)	-0.212*** (0.041)	-0.212*** (0.039)	-0.218*** (0.044)	-0.118*** (0.029)	-0.130*** (0.020)	-0.134*** (0.021)	-0.127*** (0.020)
ATU	-0.280*** (0.055)	-0.249*** (0.043)	-0.247*** (0.049)	-0.239*** (0.049)	-0.183*** (0.044)	-0.187*** (0.031)	-0.183*** (0.028)	-0.189*** (0.025)
ATE	-0.270*** (0.046)	-0.240*** (0.039)	-0.238*** (0.044)	-0.234*** (0.043)	-0.165*** (0.035)	-0.172*** (0.027)	-0.170*** (0.025)	-0.172*** (0.021)

注：近邻匹配中 k=4；卡尺匹配半径为 0.03；核匹配带宽为 0.06；ATT、ATU、ATE 标准误由自助抽样 500 次得到。

4. 半参数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

传统参数回归模型主要关注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但存在较强的前提假设难以被满足；非参数回归对模型设定形式要求较低，但容易出现“维数灾难”问题。半参数回归模型综合上述二者的优点，能够提升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因此，本部分构建半参数回归模型进行重新估计。表 7 回归 1 与回归 2 结果显示，私人转移支付与消费支出、消费率均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表明私人转移支付确实会降低留守家庭成员消费支出。回归 3 与回归 4 将私人转移支付与农地转出规模纳入同

一模型后的估计结果表明，私人转移支付与消费支出、消费率的负向关系依然显著，农地转出规模与

表 7 半参数回归模型检验结果

变量	消费支出		消费率	
	回归 1	回归 2	回归 3	回归 4
私人转移支付	-0.023*** (0.005)	-0.009*** (0.002)	-0.022*** (0.005)	-0.009*** (0.002)
农地转出规模			-0.061* (0.033)	-0.024 (0.022)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地区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Adj R-squared	0.130	0.099	0.134	0.101

消费率之间的负向关系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从总体回归结果看,私人转移支付会通过促进留守家庭转出农地,负向影响其消费支出。

(二) 拓展性分析

1. 私人转移支付对不同类型消费影响的回归分析

依据现有文献做法^[4],将留守家庭成员消费支出分为生存型消费、发展型消费与享受型消费^⑤,检验私人转移支付对各项消费支出影响的差异性,表8回归1至回归3汇报了实证结果。私人转移支

付会负向影响留守家庭成员生存型与享受型消费支出,私人转移支付增加1%,生存型与享受型消费支出分别降低约0.023%与0.039%,且至少在5%的水平上显著;但私人转移支付对留守家庭成员发展型消费支出的影响并不显著。回归4至回归6将私人转移支付与农地转出规模纳入同一回归模型后的估计结果显示,私人转移支付依旧会通过促进农地转出,负向影响留守家庭成员的生存型与享受型消费支出。

表8 私人转移支付对不同类型消费支出影响的回归结果

变量	生存型消费	发展型消费	享受型消费	生存型消费	发展型消费	享受型消费
	回归1	回归2	回归3	回归4	回归5	回归6
私人转移支付	-0.023*** (0.006)	-0.004 (0.008)	-0.039** (0.015)	-0.021*** (0.006)	-0.002 (0.009)	-0.044*** (0.016)
农地转出规模				-0.105*** (0.024)	0.024 (0.040)	-0.155** (0.064)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地区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8.522*** (0.143)	7.949*** (0.220)	5.771*** (0.447)	8.602*** (0.149)	7.890*** (0.244)	5.680*** (0.460)
R ²	0.208	0.069	0.197	0.215	0.070	0.200

2. 分位数回归模型的结果分析

私人转移支付与留守家庭成员消费之间的因果关系,可能会受到留守家庭成员原本消费行为的影响。OLS模型关注私人转移支付对留守家庭成员消费支出条件均值的影响,无法区分不同群体间存在的差异性,可能会产生估计偏误。因此,本文采用分位数回归检验私人转移支付对留守家庭成员消费的影响,并选择20%、60%、80%三个分位点进行估计(表9)。为便于比较,同时将OLS模型估计结果置于表中,表9中分位数回归与OLS回归

结果存在一定差异,说明采用分位数模型回归是必要的。具体而言,在20%与60%分位点上,私人转移支付与消费支出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但在80%的分位点上,这种负向关系不再显著,说明私人转移支付对消费的负向影响主要体现在农村中低消费水平的留守家庭成员上,对高消费水平留守家庭成员的影响并不显著。将农地转出规模与私人转移支付纳入同一模型后发现,私人转移支付通过促进农地转出,负向影响留守家庭成员消费的这一逻辑同样体现在中低消费水平的样本中。

表9 分位数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OLS	Q_20	Q_60	Q_80	OLS	Q_20	Q_60	Q_80
	回归1	回归2	回归3	回归4	回归5	回归6	回归7	回归8
私人转移支付	-0.016*** (0.005)	-0.014* (0.008)	-0.016*** (0.005)	-0.009 (0.008)	-0.014*** (0.005)	-0.014* (0.007)	-0.014*** (0.005)	-0.008 (0.007)
农地转出规模					-0.059*** (0.021)	-0.060* (0.034)	-0.054** (0.023)	-0.059* (0.030)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地区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9.275*** (0.128)	8.774*** (0.278)	9.395*** (0.154)	9.926*** (0.178)	9.322*** (0.135)	8.836*** (0.247)	9.459*** (0.147)	10.006*** (0.168)
R ²	0.175	0.118	0.112	0.081	0.187	0.125	0.118	0.088

3. 消费不平等指数的回归结果

消费能够比较客观与全面地反映居民的福利，消费不平等能够反映出福利差距，对以促进公平为目的的社会政策制定也具有较高参考价值^[43,44]。本文考察私人转移支付是否会通过农地转出影响不同留守家庭之间的消费不平等。在衡量消费不平等方面，本文利用 Kakwani 相对剥夺指数方法进行测度。同时，分别将 Yitzhaki 指数与 Podder 指数的测

度结果作为被解释变量，以保证结果的可靠性。根据表 10 回归 1，私人转移支付与消费不平等之间存在正向关系，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回归 2 将私人转移支付与农地转出规模纳入同一模型，可以看出，二者均与消费不平等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表明私人转移支付会通过促进农地转出，扩大留守家庭之间的消费不平等。以 Yitzhaki 指数与 Podder 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所得的结论不变。

表 10 私人转移支付、农地转出对消费不平等影响的回归结果

变量	Kakwani 指数		Yitzhaki 指数		Podder 指数	
	回归 1	回归 2	回归 3	回归 4	回归 5	回归 6
私人转移支付	0.005*** (0.001)	0.004*** (0.001)	0.020*** (0.005)	0.017*** (0.005)	0.006** (0.003)	0.005** (0.003)
农地转出规模		0.017*** (0.006)		0.062*** (0.021)		0.028** (0.011)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地区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0.706*** (0.035)	0.691*** (0.037)	2.626*** (0.128)	2.569*** (0.136)	0.957*** (0.070)	0.935*** (0.072)
R ²	0.188	0.199	0.185	0.195	0.185	0.196

六、农地转出影响留守家庭成员消费支出的机制分析

表 11 汇报了农地转出影响留守家庭成员消费支出的机制检验结果。回归 1 与回归 2 结果显示，农地转出规模与消费支出显著负相关，与消费不平等显著正相关，说明农地转出会负向影响留守家庭成员消费支出，并扩大消费不平等。从经济地位感知^⑥的机制检验结果来看，回归 3 表明农地转出规

模与经济地位感知显著负相关；回归 4 中将农地转出规模与经济地位感知纳入同一模型，结果显示，农地转出规模与经济地位感知的回归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农地转出会降低留守家庭成员经济地位感知，负向影响其消费支出。收益时间偏好与收入差距^⑦变量也通过了机制检验。同时，回归结果表明，农地转出通过影响留守家庭成员的经济地位感知、收益时间偏好与收入差距，扩大留守家庭之间的消费不平等^⑧。

表 11 农地转出影响留守家庭成员消费的机制检验

变量	消费支出	消费不平等	经济地位感知	消费支出	收益时间偏好	消费支出	收入差距	消费支出
	回归 1	回归 2	回归 3	回归 4	回归 5	回归 6	回归 7	回归 8
农地转出规模	-0.063*** (0.021)	0.018*** (0.006)	-0.035* (0.022)	-0.061*** (0.021)	-0.024 (0.020)	-0.058*** (0.021)	0.038* (0.022)	-0.056** (0.022)
经济地位感知				0.053*** (0.020)				
收益时间偏好						0.102*** (0.021)		
收入差距								-0.116*** (0.022)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地区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9.346*** (0.135)	0.683*** (0.038)	2.080*** (0.151)	9.236*** (0.141)	1.619*** (0.123)	9.215*** (0.140)	17.062*** (0.243)	10.633*** (0.408)
R ²	0.184	0.195	0.127	0.187	0.069	0.189	0.835	0.215

七、结论与启示

本文构建了“私人转移支付、农地转出与留守家庭成员消费”分析框架,利用中国土地经济调查数据实证检验私人转移支付对留守家庭成员消费与消费不平等的影响,并基于农地转出视角揭示了其中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私人转移支付会显著负向影响留守家庭成员消费支出,尤其是生存型消费支出与享受型消费支出,并扩大留守家庭之间的消费不平等;私人转移支付对消费支出的负向影响主要体现在农村中低消费水平留守家庭成员中,对高消费水平留守家庭成员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也是导致消费不平等扩大的原因之一。私人转移支付会促进留守家庭成员转出农地,农地转出降低其经济地位感知与收益时间偏好,并扩大留守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导致留守家庭成员消费支出降低与消费不平等程度提高。

基于上述结论,得到如下启示:一方面,刺激农村地区消费、提振农村内需,难以靠家庭内部收入或资源的再分配实现,外部资源的干预与支持政策更为重要。具体而言,可以从乡村产业振兴与产业发展的角度,推进农村地区劳动力实现当地就业、获取非农收入,以内生地激发农村地区消费动力;同时,提振农村内需需要依靠政府或市场的消费补贴,减轻农户的消费压力。另一方面,农地的基本保障功能依然十分重要,在推动规模化、土地流转的过程中,需要加快建设农村地区各项保障制度,尤其是强化农村养老和医疗保障水平;尝试探索农地流转与农地经营收益再分配相互挂钩的多重利益机制,让农户获取一些要素经营收益,切实地保障农户的权益与福利。

注释:

- ① 迁移劳动力的转移支付决策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留守家庭成员消费习惯的影响,故在模型中将留守家庭成员的主观贴现因子纳入私人转移支付函数。
- ② 时间偏好即人们对现在与未来满足程度的比值,时间偏好越高,说明人们越喜欢当下享受。本文定义收益时间偏好为“留守家庭成员更喜欢获取当下收益还是未来收益”,时间偏好越高,说明留守家庭成员越喜欢获取当下收益。
- ③ 包括家庭成员离世,家庭成员的重大疾病、意外伤害、暴力伤害,失业或经营亏损,牲畜死亡、农作物疾病/

害虫、干旱和洪水,遭受盗窃抢劫或盗窃/袭击、房屋摧毁或损坏,结婚以及其他大事。

- ④ 限于篇幅,省略汇报控制变量平衡性检验与匹配平衡性假定检验结果。
- ⑤ 生存型消费指留守家庭成员的食品支出,发展型消费是指教育、医疗与人情消费,享受型消费主要指文化等支出。
- ⑥ 经济地位感知以问卷中“您觉得在本地的经济地位如何”衡量,从低到高依次赋值1~5。
- ⑦ 收益时间偏好变量设置:仅看重未来收益,不看重现在=1;同时看重当下及未来收益=2;只注重当下收益,不管未来如何=3。农户的收益时间偏好越高,越注重当下收益与效用,从而会增加消费支出。收入差距利用Kakwani相对剥夺指数方法进行测度。
- ⑧ 限于篇幅,表11中未汇报该回归结果。

参考文献:

- [1] 陈昌盛,许伟,兰宗敏,等.我国消费倾向的基本特征、发展态势与提升策略[J].管理世界,2021(8):46-58.
- [2] 王小华,马小珂,何茜.数字金融使用促进农村消费内需动力全面释放了吗?[J].中国农村经济,2022(11):21-39.
- [3] 董秀良,刘佳宁,王轶群.中国农村金融集聚对农民消费影响的空间效应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2(2):64-83.
- [4] 唐博文,郭军.如何扩大农村内需:基于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视角[J].农业经济问题,2022(3):73-87.
- [5] 罗芳.外来农民工家乡汇款的影响因素及动机分析——以湖北省武汉市为例[J].中国农村经济,2007(S1):49-56.
- [6] TAYLOR J E, ARANGO J, HUGO G, et al.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J]. Population index, 1996, 62(3): 397-418.
- [7] ADAMS R H, CUECUECHA A. Remittances, household expenditure and investment in Guatemala[J]. World development, 2010, 38(11): 1626-1641.
- [8] TAYLOR J E, ROZELLE S, DE BRAUW A. Migration and incomes in source communities: a new economics of migration perspective from China[J].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2003, 52(1): 75-101.
- [9] 王子成.外出务工、汇款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证据[J].中国农村经济,2012(4):4-14.
- [10] 李晓春,杨彩姣.农民工汇款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联研究[J].经济科学,2018(6):118-128.
- [11] 李树茁,李聪,梁义成.外出务工汇款对西部贫困山区农户家庭支出的影响[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33-39.
- [12] HU F. Migration, remittances, and children's high school attendance: the case of rural Chin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2012, 32(3):

- 401-411.
- [13] 胡枫, 史宇鹏. 农民工汇款与输出地经济发展——基于农民工汇款用途的影响因素分析[J]. 世界经济文汇, 2013(2): 80-95.
- [14] WOUTERSE F. Migration and technical efficiency in cereal production: evidence from Burkina Faso[J].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10, 41(5): 385-395.
- [15] NGUYEN D L, RAABE K, GROTE U. Rural-urban migration, household vulnerability, and welfare in Vietnam [J]. *World development*, 2015, 71: 79-93.
- [16] NGUYEN D L, GROTE U, NGUYEN T T. Migration and rural household expenditures: a case study from Vietnam[J]. *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 2017, 56: 163-175.
- [17] 姚健, 臧旭恒. 收入冲击与家庭消费——基于私人转移支付的视角[J]. 现代经济探讨, 2022(7): 41-56.
- [18] GERBER T P, TOROSYAN K. Remittances in the Republic of Georgia: correlates, economic impact, and social capital formation[J]. *Demography*, 2013, 50(4): 1279-1301.
- [19] 刘畅, 易福金, 徐志刚. 规模与稳定性: 私人转移支付如何影响农村老人健康?[J]. 人口与发展, 2020, 26(1): 25-39.
- [20] DIMOVA R, WOLFF F C. Are private transfers poverty and inequality reducing? household level evidence from Bulgaria[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8, 36(4): 584-598.
- [21] LIPTON M. Migration from rural areas of poor countries: the impact on rural productivity and income distribution[J]. *World development*, 1980, 8(1): 1-24.
- [22] ADAMS R H, CUECUECHA A. The impact of remittances on investment and poverty in Ghana[J]. *World development*, 2013, 50: 24-40.
- [23] 解丕. 私人转移支付与农村反贫困[J]. 中国人口科学, 2010(5): 13-23, 111.
- [24] 胡枫. 农民工汇款与家庭收入不平等: 基于反事实收入的分析[J]. 人口研究, 2010(3): 89-100.
- [25] 解丕. 代际间向上流动的私人转移支付与贫困脆弱性[J]. 经济管理, 2015, 37(3): 170-179.
- [26] 李江一, 闫雪凌. 父母对子女的私人转移支付与子女劳动力供给[J]. 南方经济, 2020(2): 128-144.
- [27] 邹薇, 樊增增. 劳动力外流与资金汇回的净减贫效应[J]. 中国人口科学, 2020(4): 15-30, 126.
- [28] 唐钧. 农村“留守家庭”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J]. 长白学刊, 2008(2): 96-103.
- [29] STARK O, LUCAS E R. Migration, remittances, and the family [J].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88, 36(3): 465-481.
- [30] POIRINE B. A theory of remittances as an implicit family loan arrangement[J]. *World development*, 1997, 25(4): 589-611.
- [31] BÖHME M H. Does migration raise agricultural investment? an empirical analysis for rural Mexico[J].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15, 46(2): 211-225.
- [32] 姚洋. 中国农地制度: 一个分析框架[J]. 中国社会科学, 2000(2): 54-65, 206.
- [33] 黄祖辉, 王朋. 基于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创新视角的社会保障问题探析[J]. 浙江社会科学, 2009(2): 39-41, 126.
- [34] 杨子砚, 文峰. 从务工到创业——农地流转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形式升级[J]. 管理世界, 2020(7): 171-185.
- [35] DRECHSEL-GRAU M, SCHMID K D. Consumption-savings decisions under upward-looking comparisons[J].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2014, 106: 254-268.
- [36] 宋泽, 邹红, 赵达. 中国消费内生动力: 收入增长下的涓滴效应研究[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3(1): 5-24.
- [37] WARNER J T, PLEETER S. The personal discount rate: evidence from military downsizing program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1, 91(1): 33-53.
- [38] 张晓云. 宗教信仰、时间偏好与金融素养[J]. 经济学报, 2023, 10(4): 198-226.
- [39] 巩师恩, 范从来. 收入不平等、信贷供给与消费波动[J]. 经济研究, 2012(S1): 4-14.
- [40] 邹红, 李奥蕾, 喻开志. 消费不平等的度量、出生组分解和形成机制——兼与收入不平等比较[J]. 经济学(季刊), 2013(4): 1231-1254.
- [41] 韩菡, 钟甫宁. 劳动力流出后“剩余土地”流向对于当地农民收入分配的影响[J]. 中国农村经济, 2011(4): 18-25.
- [42] 盛来运, 方晓丹, 冯怡琳, 等. 家庭人口结构变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微观家庭面板数据的分析[J]. 统计研究, 2021(11): 35-46.
- [43] BLUNDELL R, PRESTON I. Consumption inequality and income uncertainty[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8, 113(2): 603-640.
- [44] 刘靖, 陈斌开. 房价上涨扩大了中国消费不平等吗?[J]. 经济学(季刊), 2021(4): 1253-1274.

责任编辑: 李东辉